

披荆斩棘的孤胆英雄孙中山

朱宗震

烈火的孕育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创建中华民国的主要领袖。1866 年 11 月 12 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谱名德明，幼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初字日新，后改逸仙。流亡国外期间，曾化名中山樵、高野长雄。革命者无意间称他为孙中山，民国后就成为社会上的习惯称呼。他自署本名孙文，英文名 Sun Yat-sen。

孙中山的故乡背山临海，土地贫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浩瀚的大海、葱郁的山林，并不能滋润众多的人民，这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是一个贫苦的农民，经常用番薯糊口。孙中山幼年要上山打柴，牵牛放牧，生活艰辛而又单调闭塞。传统的祖先崇拜、神道设教、宗法统治，加上平庸的生活可以扼杀任何一个天赋的精灵。

时代的剧变，颠倒了区域发展的序列。机遇终于出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被列强的炮舰打开。翠亨村紧靠澳门，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中，既饱受侵略的痛苦，也拥有首先接触西方文明的幸运。这个原先孤寂封闭的村落，比较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更早地卷入到世界文明交汇的大潮中去。滨海的人民，

长年在险恶困苦的环境中生存，养成了粗犷剽悍、敢闯敢干的品格。海通之后，一批批人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出外谋生，许多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可是，也有一批人历经磨难，在海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建立了新的生活。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是其中之一。贫困的生活，迫使他冒险到了檀香山，智慧和勤劳，使他在这块正待开辟的土地上，成长为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孙家的经济地位从此改变了。1879年6月，孙中山随母亲前往檀香山依傍哥哥生活，从此，闯入了一个新的广阔的世界，摆脱了愚昧、闭塞、压抑的小天地，蛟龙入海，可以翻江倒海，大展宏图了。

孙中山幼年家贫，上学很晚，四书、五经还读不懂，当然说不上知书达礼。太平天国的暴风雨刚刚过去，而清王朝依然风雨飘摇，危机四伏。村野山林，星火点点。太平天国奋斗的业绩，在翠亨村这个贫困的村庄里很容易引起共鸣。孙中山饱听天国的故事，在心田里埋下了反抗现存秩序的火种。他出洋途中，看到新式的轮船、辽阔的海洋，感到非常兴奋和新奇，激起强烈的求知欲望。

到了檀香山后，孙眉送他进了基督教会办的一所学校学习。孙中山学习慧敏而又勤奋，西文和中文都长进很快。小小年纪，很容易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在檀香山充分意识到了祖国的落后和混乱，同时，他在学校里也遭到白人和当地人的侮辱和欺凌，胸中积蓄着怒火。开阔的视野，郁积的情结，促使他立志改造自己的国家，使其走上文明发达的道路。

1883年，孙中山准备加入基督教，遭到哥哥的强烈反对，被送回国内。这时候的孙中山，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他已深深地被西方的科学和法治精神所吸引，回国途中看到清政府的腐

败和社会的落后，感到深深的压抑，他强烈地向人们呼吁改良政治和社会的必要。他回到家乡后，像一团炽烈的火球，着手从事乡政的改良。为了破除神道迷信，孙中山和他的好朋友陆皓东一起捣毁了北极殿神像。他的叛逆精神开始喷发出来，结果，在家乡立脚不住，只好远走香港。

此后数年间，孙中山在香港、广州等地的西式学校学习，1892年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他不仅钻研医药，还广泛涉猎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时，以学校为基地，广交朋友，联络同志。中法战争失败，再次激发了他的忧患意识。孙中山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一起放胆地抨击满清王朝，被亲友们称为四大寇。在当时，君主专制主义笼罩着全中国大地的時候，香港这块被英国占领的中国土地，是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部，一股小小的自由、民主的潮流在喷涌。

孙中山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广州行医。然而，行医只是他深入社会、联络同志的一种手段，他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探索着社会改造的方法。一些志士开始团结在孙中山周围，郑士良、程璧光等人会和会党、防营（一种非世袭的清军部队）也开始建立联系。一种新型的革命团体在酝酿中。这是一个死气沉沉、黑暗笼罩而又危机四伏的时代，旧式的反抗既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势力——会党，在各地滋蔓，形成点点星火。孙中山已经贴近了这一火源，要让它熊熊燃烧起来，随后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但是，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他在行医过程中，同士大夫阶层开始建立了一点联系，看到了国家在洋务派的主持下，也取得了一点进步。他想尝试一下自上而下的变革和改良。1894年初，孙中山一连几天，足不出户，关起门来起草上李鸿章书，希望国家“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

其用，货能畅其流”。李鸿章当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是最有成就的洋务派领袖，他组织了使用洋枪洋炮的军队（淮军），建立了北洋舰队，建设了新式兵工厂，还着手修造铁路，建立机器纺织厂，以及新式学校等等。孙中山对他寄予一线希望。

寂静中的惊雷

在封建社会里，侯门深如海。1894年春夏之交，孙中山和好友陆皓东一起，从广州北上，前往上海。他费尽周折，寻找上书李鸿章的门径。随后前往李鸿章的驻地——天津。这时候，日本出兵朝鲜，中日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军务倥偬。尽管孙中山疏通了很多门径，上书之后，李鸿章还是拒绝接见这位默默无闻、毫无功名的年轻人。孙中山的上书被敷衍了事，衙门的腐败习气，使他对和平变革的希望，彻底幻灭。上书失败后，孙中山游历了北京、天津、武汉诸地，考察地形和各地形势，看透了清王朝腐败无能、内囊空虚的本质，增强了推翻清王朝的信心，促使他最后下了革命决心。

是年秋，清军在中日战争中连连溃败，朝野震动。孙中山从上海悄然前往哺育他成长的檀香山，回到热爱、关怀祖国的侨胞中间，着手组织革命团体。

华侨是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社会群体，因而也最能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同时，他们在异国的文化氛围中，饱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欺凌，最切身地体会到国家贫弱的痛苦，因而迫切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走上现代文明的轨道。当然，万事开头难。孙中山在檀香山宣传革命，尽管侨胞都是冒险犯难过来的人，敢于承担天大的风险，但主张反清复汉，绝大多数人还

是认为这是谋反作乱，会遭到破家灭族的恶果，因而不愿附和。华侨毕竟是风浪中锤打出来的，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首先支持他，愿意破家举义，同时，帮助他联络亲朋好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经理何宽的家，召开了兴中会的成立会，有20多人出席。兴中会章程，强烈地指出了列强侵略、庸奴误国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号召集会振兴中华，并提出了秘密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完全新型的革命团体，她是茫茫黑夜中的一盏孤灯。孙中山高举着这盏孤灯，勇敢地出击，企图一举烧毁清王朝这只纸老虎。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立即着手发展组织，筹措经费，训练队伍。1895年1月，他前往香港组织兴中会，并着手建立机关、组织队伍，准备起义。这时，甲午战后，清军一败涂地，《马关条约》签订后，朝野愤激，清政府的统治陷入危机之中。孙中山是位感情激越、思维飘逸、意志坚强、敢作敢为的英雄，他相信冒险的重大价值，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开辟前进的道路。他的理想和目标，非常具有煽动性而诱人注目，他的计划却又经常风险太大而骇人听闻。他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孙大炮”的绰号。正当孙中山被广州当局和博雅君子目为好狂言的莽汉而漫不经意的时候，他却一步步地把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孙中山集合同志，组织了一批民团、会党，策动了一部分军队，准备在重阳节（10月26日）举义。他大胆地主张选拔精锐百人，一举袭取总督衙门，进而控制广州。他是位孤胆英雄，冒险中的冒险，同他一起冒险造反的同志却不敢赞成他的计划，于是改为分道攻城。然而，事先计划泄露，清吏大肆捕人，起义未及发动即遭镇压，陆皓东被捕杀，孙中山只好部署撤退。起义

虽然失败，革命的火种却从此播下。

第一次广州起义，它的力量、它的行动，不过卷起了一朵小小的浪花，然而它的含义却如夜半惊雷，非常深远，因而引起了国内外的注目。不过，当时国内的人心，还对清王朝寄予希望，未能摆脱君主神圣思维的束缚。孙中山既遭到清政府的通缉，又被芸芸众生目为乱臣贼子，国内环境险恶，无法存身，只好取道香港流亡日本。不久，又赴檀香山、美国宣传革命，并于 1896 年 9 月到达英国。

孙中山到达伦敦后，就去拜访他在香港上学时的老师康德黎，以后又常去那里。康德黎的住处离中国驻英公使馆不远，中国公使奉命探寻孙中山的踪迹，发现后派了个广东籍译员邓廷铿将孙中山诱至公使馆门口，强行拘捕，准备秘密将孙中山运送回国进行惩罚。这就是著名的伦敦蒙难。孙中山用尽了各种办法，终于赢得了公使馆雇员的同情，把孙中山遇难的消息通知了康德黎。而康德黎又多方奔走，屡经波折，才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终于出面干预，迫使违反国际惯例擅自捕人的中国使馆释放了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也由此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意外地提高了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影响。

孙中山在英国居留了一年时间，经常夜以继日地在大英博物馆图书室里博览群书，广泛涉猎了各种政治、经济、军事书籍和自然科学著作。同时，他广交朋友，实地考察英国社会，密切注意欧美动向。他非常同情工人阶级的遭遇和他们的斗争，为此，研究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深入思考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道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理论，正在酝酿过程中。

1897 年 8 月，孙中山为了实际从事革命运动，重新来到日本。他一方面在华侨中进行宣传，一方面广泛结识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同真心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翌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纷纷流亡日本，有一批维新派人士也开始同情并转向革命。孙中山坦诚相见，向他们提供帮助，希望彼此合作，推翻清王朝。但康有为以帝师自命，拒绝和孙中山来往。梁启超则随机应变，一度标榜革命，却乘机侵蚀了兴中会的许多阵地。不过，梁启超在日本东京创办大同学校，他的学生和留日学生往来密切，孙中山也通过大同学校和留日学生建立了联系，播下革命的种子。

1899—1900 年间，义和团运动兴起。孙中山不赞成义和团盲目的排外行为，但他预感到清政府将再次陷入统治危机，起义的时机正在到来，因而抓紧了起义的准备。当时，康、梁正在组织勤王起兵，由唐才常在國內主持。孙中山一方面介绍梁启超赴檀香山找自己的哥哥孙眉展开联络华侨活动，一方面和唐才常合作联络长江会党，准备共同起义。同时，孙中山又通过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和李鸿章有所联系，港英当局也支持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策动孙中山和李鸿章合作，宣告两广自主。1900 年 6 月，正当八国联军入侵之时，孙中山南下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起义的组织活动。但在新加坡，孙中山的活动受到康有为保皇派的阻挠。在香港，李鸿章正奉命北上议和，拒绝和孙中山合作。在长江流域，会党势力纳入了勤王旗帜之下，唐才常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捕杀，起义未发即告失败。而在檀香山，梁启超更假借孙中山名义，发展保皇会组织，使孙中山蒙受重大损失。但孙中山不屈不挠，仍决心把握时机对清王朝进行一次冲击。

是年 9 月，孙中山由日本抵达台湾。他一方面派郑士良到广东惠州联络会党武装，准备起兵，一方面，希望争取占领台湾的日本当局的支持，率领骨干队伍，输入军火，与起义队伍会合。10 月 6 日，惠州起义爆发，郑士良率部转战各地，屡获胜利，队伍发展到 2 万多人。但是，台湾的日本当局突然改变了主意，阻止孙中山率部支援惠州起义，起义军弹尽援绝，被迫于 10 月 22 日解散。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重返日本。这时，慈禧和光绪已逃往西安，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国内一片混乱，人民开始同情革命。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但孙中山再也不感到孤立无援，一批批的志士仁人，开始转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顽强的播火者

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之后，国内士大夫中间的革命思潮开始蓬勃发展，而留日学生界更是充满了革命激情。1903 年，黄兴在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翌年，发动了长沙起义。同年，胡瑛在武昌组织了科学补习所，在湖北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后来演变为日知会。蔡元培也在上海组织光复会，进行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其他各地的革命小组织也陆续成立。

孙中山继续仆仆风尘，往来于日本、南洋、欧美各地，在华侨中发展革命组织，向各国朝野人士寻求支援。同时，他指导创办了《开智录》（日本横滨）、《中国时报》（香港）等刊物，从事宣传活动。这时，康、梁保皇派越来越反对革命，终于导致了两派的决裂，孙中山开始和保皇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在檀

香山、南洋等地，重新夺回被保皇派占领的阵地。

1905 年初，孙中山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和留欧学生朱和中等商讨革命方法，发展革命组织。孙中山长期侨居海外，只在华侨中发展革命组织。当时国内空气沉闷，只有会党在各地撞击清政府的统治秩序。他在和保皇派的长期接触中，又屡受挫折，从而使他认为秀才不能造反。而现在，青年留学士子的革命激情十分澎湃，终于使他放弃了成见，决心在留学界发展革命组织。同时，朱和中等向孙中山介绍了湖北革命志士深入新军活动的经验，建议在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孙中山开始认为，军队服从命令，不能革命，经过双方三日夜的激烈辩论，孙中山终于同意在新军、会党中齐头并进的方策。留学生的革命激情和革命的客观形势，极大地充实了他的策略思想。

这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各种革命的小团体、书报杂志，如雨后春笋。这些学生，大都出身书香门第，受过传统教育，清王朝的严重危机，列强的肆意侵袭，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排满情绪。他们学习了西方的政治理论，看到了日本式的议会制度，也产生了朦胧的自由、民主意识。然而，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知识分子，地方小团体意识很重，缺乏凝聚力，行动涣散。是年 7 月，孙中山从欧洲再次来到日本，他在留学生中久享盛名，因而产生了一股旋风般的凝聚力。留日学界对孙中山的到来，十分欢迎。各派领袖纷纷前来与他晤谈，他们深深感到有统一组织的必要。孙中山不畏艰险的毅力，早为留学界所景仰，他在和留学生广泛接触中，发表演讲，秘密商谈，驳难辩论，又一扫留学生中“孙汶”（清政府诬称孙文为孙汶）粗犷豪放汪洋大盗的错觉。孙中山温文尔雅的修养、热情奔放的气质、学贯中西的渊博知识，更加令人倾倒。然而，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通过长期钻研西方文化、考察西方社会，针对中国社会矛盾，总结出来的一套革命理论和纲领，是刚刚接触西方文化皮毛的留学生所望尘莫及的，他成了众望所归的领袖。8月13日，东京留学生组织欢迎大会，听众蜂拥而来，千人的会场顿时爆满，会场之外还有数百人隔窗观听，孙中山气势磅礴的演讲，获得了满场的喝彩。8月20日，在东京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有100多人出席，他们代表着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体，孙中山被公推为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方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写进了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革命的纲领。中国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党终于诞生了。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创办了《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他在发刊词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即著名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他指导《民报》与其他革命报刊一起，继续和保皇派论战，并且，亲自撰写了许多文章，批驳保皇派害怕民众、害怕革命、害怕列强瓜分的错误观点。他强烈指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①他再三强调，只有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由先进分子去领导民众，才能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平等、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在辩论中，孙中山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提出了革命的次序，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使国民循序渐进，养成自由平等的资格。同时，提出将来的宪法，在西方行政权、立法权、裁判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考试权、纠察权，构成五权宪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通过革命派和保皇派的激烈辩论，革命派的影响大大扩大了，革命浪潮风起

云涌，迅速向全国各地扩展。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加紧了组织起义的工作，自己往南洋一带发展革命组织，筹措起义经费，黄兴深入两广地区，联络会党、军队。但革命党正在草创时期，并无严密的组织方式，孙中山热衷于具体的起义组织活动，还不大懂得如何完善党的组织功能。同盟会员们士大夫习气还很重，各有门户之见。孙中山本人又好独行其是，彼此难免隔阂。1907年3月间，孙中山亮出了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新的国旗，指挥革命，但遭到黄兴强烈反对。孙中山囿于个人感情，出言不逊，两人几乎决裂。但黄兴最终以大局为重，屈从孙中山，二人继续团结奋斗。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07年至1908年间，孙中山先后发动了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孙中山当时不仅遭清廷通缉，而且遭到香港殖民当局以及日本的驱逐，被迫在国外到处流亡，已经很久无法践履国土，因而很难深入内地指挥革命。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一役中，孙中山终于有机会踏上祖国的土地，登上镇南关的炮台，他异常兴奋，亲自发炮攻击敌军，第一次尝试了一个革命领袖投入战斗的滋味。在这些战役中，黄兴多次深入内地，率领起义军浴血奋战，迭挫强敌，威震敌胆。他的坚毅和勇敢，赢得了人们的高度尊敬，成为同盟会实际指挥起义的军事领袖。

孙中山几经挫败，从不气馁，依然夜以继日地工作或者学习，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又及时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屈不挠地从事新的斗争。孙中山组织的历次起义，除了骨干分子从境外输入军火之外，主要是利用会党这一群体力量。但会党领袖没

有新知识，很难调度使用，甚至只图钱财。当时革命党人认识不到其他群众组织方式，正好辛丑之后，清政府在各地组织新军，根据湖北的经验，新军中有文化的人比较多，游民成份少，多数是有身家的农民，又接受了新式军事训练，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于是，决心把革命工作重心转向新军，尤其在广东新军中展开工作。

孙中山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义，屡遭失败，而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却无人过问。光复会系统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本与孙中山政见有异，稍有不满意，即发起倒孙风潮。黄兴力顾大局，尽力维护孙中山，驳斥章、陶种种诬蔑不实之词，终于使风潮得以平息。只是组织问题，并没有解决。同盟会的组织方式处在很低级的水平上，孙中山深感指挥不灵，他一度甚至想组织中华革命党，但并未实现。这时候的孙中山，被中国周边地区的殖民当局驱逐，只好远赴欧美，对国内的情形，越来越隔膜，实际工作，完全由黄兴来主持。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起义之前，曾发生军警冲突，引起当局戒备，收缴了枪支子弹，主持起义的倪映典被迫提前起义，起义军没有子弹、被清军击败。广州新军是同盟会核心领导直接经营的革命阵地，经过长期工作，新军士兵大多倾向革命。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失去了最精锐的革命机关，余下的部分，也遭当局的严密监视。清政府深感训练新军犹如养虎自卫，越来越依靠思想陈腐的巡防营等旧式军队。这时，孙中山正在美国，闻讯后即向黄兴等提出了新的起义计划，他自己在美国也极力争取外援，组织革命力量，筹措起义经费。11月13日，孙中山秘密东归来到马来亚的槟榔屿，主持同盟会骨干会议。那时候的满清王朝，风雨飘摇，犹如风烛残年，一推即可

倒地不起。全国各地到处布满干柴，星星之火，即可燎原。革命党人不明白，为何如此大好形势，竟然错失机会，不免有点心灰意懒。孙中山以坚毅、达观的精神，剖析了光明的前景，积极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谋大举，会议决心进行充分准备，集中全党精英，在广州再次组织起义，期在必胜。

孙中山在亚洲无法立足，会后只好前往美洲，为革命筹款，起义的具体部署指挥，仍由黄兴主持。辛亥革命的党人，大都敢于冒险犯难而不善于观察形势，党的领袖又长期流亡海外，更不具备切身体察形势遽变的可能性，因而主观的计划安排，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不易合拍。内地的党人，虽有深入基层的长处，但眼界比较狭窄，缺乏高瞻远瞩的领袖人才。其实，他们手中始终没有组织起强大的力量，只是满清王朝这只纸老虎实在太破旧了，人们深信它一戳即破。1911年4月27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领一部由留学生、华侨子弟等组成的选锋在广州起义，浴血死战。但组织工作出现疏漏，各部未能协同，作为主力的广州新军未能策应起义。而清军事前已有戒备，秩序未乱。黄兴在战斗中英勇负伤，选锋伤亡累累，被迫撤出战斗。

“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同盟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同盟会领袖们深感精疲力尽，一筹莫展，情绪沮丧。宋教仁等于是上海组织中部的同盟会，深入长江一线组织起义，并作长期工作的准备。然而，经过新军起义和“三·二九”起义的震撼，各地清朝大吏惶惶不安，手足无措，再也无心与革命拼死为敌。而全国的人心，看到聪明俊达的青年学子赴汤蹈火的英勇行为，无不感到震惊和兴奋，渴望着革命的早日来临。

共和之魂

1911 年秋，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一方面将正在民办的铁路线收归国有，另一方面又将路权拱手让与列强。于是，各地掀起了保路运动，而四川的风潮特别浩大，各地同志军起义，震撼了清廷。清政府手忙脚乱之际，派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从湖北调兵前往镇压。各地风声鹤唳。

在湖北新军中，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孙武领导的共进会，进行了长期、深入的革命组织工作。时局激烈动荡之际，两派组织迅速联合起来，人心的浮动，使他们凭直觉体察到起义时机的来临。尽管屡遭挫折的同盟会中枢人士主张长期准备，但他们仍决心冒险发难。然而，从地下发难的起义，总是难以部署周密，起义发动之际，领导机关又被清吏破获。但是，社会爆炸的形势，几经积蓄，已经趋于成熟。10 月 10 日，武昌新军士兵，不顾一切，工程营熊秉堃首先举枪发难，各营闻风响应。六神无主的武昌清朝文武大吏，再也无法组织镇压。武昌起义终于胜利了。然而，缺乏现代政治训练的武昌革命党人，群龙无首，竟群相推戴稍得兵心的前清混成协统黎元洪出任都督，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

孙中山长期在外流亡，为革命争取外援，筹措经费，难以仔细体察到时局的变化，只是深信人心已经大变，革命一定成功。这时，他正到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典华城）。12 日中午，在旅馆饭厅吃饭时，从报上看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孙中山事先对组织这次起义一无所知，深感意外。而这种意外的成功，更使他兴奋不已。他后来屡屡表彰武昌起义士兵，那种

不计成败，在奋斗中求机遇，在冒险中求生存的精神，和他自己的冒险品格产生强烈的共鸣。

当时，孙中山从内心说，非常希望立即回国投入战斗。但他理智地衡量全局，深感革命的财政问题和列强的态度，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于是，决心先在海外多做些外交工作，为革命争取国际援助。他首先向美国政府进行试探，但没有成功，然后横渡大西洋到达英国伦敦，与英国政府和四国银行团交涉，希望借款 100 万英镑。再取道巴黎从马赛启程回国。孙中山在同英、法朝野人士的接触中，得到的回应比较冷淡。当时，列强采取中立政策，虽答应不向清政府提供贷款，也拒绝向孙中山提供支持。同时，孙中山了解到，英国政府支持袁世凯，当时，袁正准备出任清朝的内阁总理。

这样，孙中山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国。在回国途中，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袁世凯指挥的清军攻占汉口、汉阳；另一方面，陈其美与江浙资产阶级和立宪派人士合作，在上海组织起义成功，并组织江浙联军占领南京，从而使革命中心转到上海。但革命阵线内部纷繁复杂，正在筹组革命政府，迫切盼望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同时，南北双方已在上海开始停战议和，谋求一个妥协方案。12 月 21 日，孙中山经过香港，与廖仲恺、胡汉民等晤谈，以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他虽然缺乏实力作为凭借，仍雄心勃勃，决心前往沪、宁，创建民国政府，号召天下，以推翻满清王朝。25 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他豪情满怀地对记者表示：“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②

孙中山立即着手革命政府的组织工作并主持同盟会本部事务。他给处于停顿状态的革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朝气，激发

起新的热情。孙中山在民国体制问题上，坚持采用总统制，以适应革命的战斗体制，反对用内阁制使政府陷于疲软无力地位。他严肃地批评了“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错误思想，坚决主张贯彻革命方略，以革命党的力量，争取革命的胜利。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庄严地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组成南京临时政府。

孙中山以激进的姿态，在南京开国，引起了袁世凯的忌刻。袁施展阴谋手段，使和谈陷于停顿。孙中山决心开战，号召独立各省，组织三路北伐。但是，孙中山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南京临时政府几乎没有财政收入，外债十分难借，而军队游民成份充斥，将校派系林立，陆军总长黄兴难以下战斗动员令。资产阶级虽然支持共和，但已难以忍受革命的阵痛，迫切希望和平。于是，孙中山只好重新回到南北议和的道路上来，以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国为最低限度的要求。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随后，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袁世凯被选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③，改都北京，就任总统职，并着手组织统一的民国政府。

孙中山让出了总统职位，但并没有停止奋斗。他在准备交接期间，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民主共和的精神：“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他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命令，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种种陈规陋习，向全国人民灌输了民主共和精神，确立了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

不久，南北各党派联合的唐绍仪内阁宣布成立，4月1日，孙中山辞卸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深深感到自己难以指挥同盟会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国内经济、

财政十分困难，列强侵逼，在政治上也难以施展。同时，孙中山以为宣誓对新总统有约束力，国家政体有约法作保障，可以维持一个小康局面。因此，他决定暂时搁置政治和党务方面的活动，着重于社会事业。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在自己主持下，在 10 年内，建设 20 万里铁路线，为新中国奠定经济的基础，使中国出现一个大飞跃，一举成为世界头等强国。

孙中山对国内的实际情况显然有点隔膜，对国家美好前景的憧憬，未能建立在对国内形势深切透彻的观察上。8 月间，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北上到达北京，与袁世凯会晤。他坦率地希望袁世凯担任十年总统，练兵百万，与他的经济计划相配合。袁世凯虚情假意，满口应承，使孙中山陶醉在和平建国的幻梦之中。

事实上，民初的议会民主制度，只是一种弥补政治真空的暂时组合方式，中国哪里具备了民主制的社会条件？天真的年青的革命党人，也只是在作一种浮面的民主努力，而不懂得去培植民主的基础，组织真正民主制的社会力量。年青的领导人宋教仁，雄心勃勃，具体着手把一个革命组织同盟会，改变为公开的从事合法活动的议会政党——国民党，吸收了大量士大夫传统的官僚分子，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以为凭借这个乌合的党，就可以掌握议会多数，就可以和袁世凯争夺政权。当时，孙中山被推举为国民党理事长，但孙中山坚持自己的方针，因而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1913 年初，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宋教仁满以为可以运用议会多数，制定一部采用内阁制的宪法，自己就可以出任内阁总理，掌握行政实权。其实，袁世凯并不依靠议会来和宋教仁争权，他采取了直截了当的办法，于 3 月